

陶晶孫《日本への遺書》の版本考察

武 継 平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conducted a detailed research on three different Japanese editions an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Suicide Note for Japan*, one of Jingsun Tao's works. We clarified some problems ignored by the research community in the past. For example, the value assessment of Japanese literary critics on Tao's Japanese works; some changes in the works in different versions, and the reason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we made two important conclusions. First, Haruo Sato, Teiichi Suda and Toramaru Yito, who respectively represented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of an era in Japan, all commented on Tao's works through general evaluation in the past. In fact, their comments on Tao's literature did not focus on his Chinese literary activities, nor focused on his "popular literature" in Shanghai. In contrast, more attention and criticism on him in Japan are focused on his Japanese works. I call the perceptual valuation of writers developed in Toramaru Yito's "metaphysics" philosophical criticism in 1995 a qualitative change. Second, Chinese domestic criticisms have been trapped in Tao's political judgment and ignored his literary achievements. That stagnation was not limited to the study on his works in Japanese. Althoug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hinese edition of *The Suicide Note for Japan* in 2008 was only a start, at least it can be said that Chinese academics have declared the end of the barren era of study on Jingsun Tao's Japanese works.

本文目次：

引 言

- <一> 単行本《日本への遺書》及版本考察的問題所在
- <二> 《日本への遺書》原始版本概説及其収録内容
- <三> 有關初版本《日本への遺書》中的《序文》、卷首照片及《あとがき》
- <四> 普通社版《日本への遺書》所收作品與創元社初版之内容比較
- <五> 普通社版與創元社版的不同及版本變化的原因
- <六> 東方書店版《日本への遺書》
- <七> 關於中文版本《給日本的遺書》

結 語

引 言

位於東京都南青山的都營陵園“青山墓地”園內，“解放運動無名戰士之墓”的合葬者名單里面，與著名文學家新居格 (Itaru Nii) 並排刻著一個中國人的名字—陶熾 (碑上刻字：陶熾 新文學

運動 醫療)。陶熾，即中國現代著名文學家陶晶孫。

陶晶孫 (1897.12.18-1952.2.12) 原名陶熾，畢業於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在校期間與郭沫若等人組建著名文學團體“創造社”。魯迅、郭沫若皆棄醫從文，陶晶孫亦從文，但却終未棄醫。作為醫生和從事醫學研究的學者，尤其在衛生學研究及人體寄生蟲研究方面卓有建樹，並獲有千葉大學醫學博士學位；作為文學家，上世紀 20 年代末於上海接替郁達夫主持中國現代左翼文學刊物《大眾文藝》，創辦劇社、創作和翻譯劇本，50 年代初逃離台灣到日本避難時期，直接用日文創作了一批小說和散文，直至 1952 年 2 月因肝癌突發逝世，屬於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唯一直接用日文創作的小說家。

本文考察的對象，即日文作品集《日本への遺書》，是陶晶孫僅有的一部用日文創作的文學隨筆集。日本文學界以及研究界對於這本外國文學家用日文寫下的“給日本的遺囑”，有着很高的評價。

著名中國文學研究家、魯迅全集翻譯家竹內好將《日本への遺書》對日本的文明批評視為“良藥苦口，讓人耳目一新”¹。德國文學研究大家手塚富雄讀後贊不絕口，謂之“發自一文弱知識分子心胸的文明批判”，乃“讓人心靈震顫的自由之聲”²。現代著名文學家奧野信太郎稱譽“隨筆《中日友好》一文，真可謂驚世文學，為世上有識者矚目”³。著名作家澤地久枝給陶晶孫定位為“日中關係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人物”⁴。

然而，提起這樣一本對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日文學交流史來說都不無重大意義的作品，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都談不上熟悉。日本讀者不熟悉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印刷數量少和版本多變造成的較大差異；中國讀者不了解這本書，是因為它的中譯本直至 2008 年才面世，在之前的半個多世紀裡，中國讀者就連有這樣一本書存在都不知道，更不用說了解此書的創作背景了。甚至到了 90 年代，還有相當著名的研究者撰文說：“1963 年普通社再版本是陶晶孫去世後由陶夫人整理出版的”⁵，根本沒分清該書的版本種類和變化。

鑒於這種混亂情況，本文將對在日出版的幾種不同版本和中國出版的中譯本分別進行詳細考察，以揭示各次出版的背景和釐清各個時期對陶晶孫的評價。

〈一〉單行本《日本への遺書》及版本考察的問題所在

關於作家陶晶孫，已故日本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家伊藤虎丸曾經有過中肯的價值定位。伊藤認為“陶晶孫實際上是與魯迅有同樣意義的作家”，而“對日本文學和思想給予影響的中國作家，除了魯迅以外，陶晶孫是惟一的人物”。至於《日本への遺書》這本隨筆集，伊藤更是不惜贊詞。他認為這部作品涉及到日本和中國兩個國家知識階層的思想和意識交流，並指出它“能夠讓日中兩

1 竹內好《日本文の名手》，初見日本刊物《中國》20 号。

2 1952 年 12 月 8 日《読売新聞》。

3 《西日本新聞》1952 年 11 月 9 日。

4 澤地久枝《郭をとみと陶みさを》，1981 年《文藝春秋》4 月号、5 月号。

5 劉平《陶晶孫的文學創作及文學活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2 年第 4 期第 233 頁。

國知識人重新認識戰後民主主義”和“讓人體味到日中兩國知識人的心靈交流”⁶，並對日本戰後的一代知識分子產生了深遠影響。

據筆者調查，迄今為止似尚無人對此書的版本進行考察。過去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人大多只知道有中日文兩個版本，而在中國國內則只有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8 年 8 月第 1 版《給日本的遺書》這一個版本。中文版《給日本的遺書》除了封皮和扉頁上標注的“曹亞輝、王華偉譯”寥寥數字之外，版權頁中只字未言及譯自何種外文版本、原書的出版信息以及從初版到中譯本初版各個版本的變化及引起變化的原因。

〈二〉《日本への遺書》原始版本概說及其收錄內容

陶晶孫於 1952 年 2 月 12 日因肝癌突然惡化病故於日本千葉縣市川市。十多年前筆者曾親自探訪過陶晶孫故居。發現陶晶孫自 1950 年携家眷逃離台灣最後定居在日本千葉縣的家，竟然就座落在郭沫若亡命日本時期隱居的住宅附近。雖然佐藤富子於 1947 年向千葉市政府遞交了跟郭沫若正式結婚的申請，並毅然接受主動脫離日本國籍這一受理申請的苛刻條件經由台灣到香港尋夫，市川的老房子一直由次子郭博居住。可以說陶晶孫携家眷逃至日本後落地沒有選擇夫人佐藤操的家鄉仙台而選擇了市川，是經過事前精密籌劃而絕非偶然。日中戰爭持續了 8 年，也許故鄉仙台已經不再願意容納佐藤富子姊妹這兩個嫁給了中國人的女兒。換言之，陶晶孫一家最後定居在千葉可謂實屬無奈。一年後陶晶孫向政府提交的永居申請（相當綠卡簽證）獲準。隨後，他在開業行醫和兼任長尾研究所寄生蟲研究的同時，一面接受東京大學教授倉石武四郎的極力推薦，開始擔任東京大學中國文學講師，並恢復了跟日本文壇的交往。就在他準備開始大量文學創作之際，肝癌突然奪走了他的生命。

《日本への遺書》這本日文作品集出版於作者陶晶孫去世之後。也就是說該書內容雖為作者原創，但將這些零散的作品整理選編為集和出版這兩件事情，都不是作者本人所為。

關於《日本への遺書》，目前在日本能够查到的日文版本有三個，作者名及書名完全相同。唯一的區別是出版社和出版時間的不同。三個版本若依照出版發行時間來排序，那麼第一個版本由日本創元社 1952 年 10 月出版，第二個版本由普通社於 1963 年 5 月出版，最新的一個版本出版時間是 1995 年 7 月，出版社則是日本東方書店。

下面來看《日本への遺書》的內容。

現將原始日文初版本《日本への遺書》的目次抄錄如下。

〔序文〕

陶晶孫が遺著のために	佐藤 春夫
陶さんを想ふ	河上徹太郎
序	吳 清源

6 伊藤虎丸《〈解題〉戦後五十年と『日本への遺書』》，1995 年日本東方書店出版《日本への遺書》第 210 頁。

寒山寺の味	内山 完造
陶晶孫への手紙	草野 心平
〔 I 〕		
日本見聞記		
日本に住む楽しさ		
近頃の日本		
中日友好のために		
落第した秀才・日本		
革命と文學		
一年間		
黄言集		
挨拶		
依古地		
進貢歸朝		
危邦より亂邦へ		
好きと云うこと		
松林の亭子		
身邊雜記		
箱根遊記		
蘭花の變り咲き		
入院記		
セントラルサプライの泥棒		
漢文先生の風格		
淡水河心中		
〔 II 〕		
留守番日記		
通勤日記		
弱蟲日記		
ブシュキン・ゴルキー・魯迅		
周作人と魯迅		
昔話		
藤村雜記		
曼殊雜談		
少年時代の思い出		
初めて汽車に乗った話		
烹齋雜筆		
あとがき	佐藤 操
父陶晶孫の思出	陶 棣士・陶 方之・陶 伊凡
追憶と業績	柘植 秀臣



(附圖)

筆者有幸收藏了《日本への遺書》的初版本（參見附圖）。無論是封面彩壺的造型或着色，還是封底的祖母綠平湖衬映翡翠色圓月，都讓人感到一種日本大正年間或昭和初年風靡日本的唯美主義藝術氛圍。作畫者署名 Shao Chin.Chan，陶晶孫夫人佐藤操女士在本書後記中專門提到，“此度出版專門為此揮毫作畫並負責裝幀”的，“是已故田中阿歌麿爵士之女陳少卿畫伯”，此人跟陶晶孫生前交友過從甚密。查日本平凡社 1966 年版《世界大百科事典》（第 14 卷），果然有田中阿歌麿（Akamaro Tanaka）其人。生卒年月日為明治 2 年 9 月 26 日～昭和 19 年 12 月 1 日，子爵。日本著名地理學家，湖泊研究之先驅。至於田中這樣一個日本名門望族的“令嬢”為何被陶晶孫夫人稱為“陳少卿”，尚有待進一步詳考。

初版《日本への遺書》的腰封為橘黃色，顯得十分刺目。腰封前面部分除了向讀者推薦此書的 7 位日本文化界著名人士的名字之外，還橫寫着這樣一句話：“這是一本熱愛日本、死在日本的中國作家的日文遺稿”。腰封的書脊段豎寫着“幽默與憤怒”兩個日文詞，格外奪目，似乎暗示着本書內容。腰封後面部分印着佐藤春夫、河上徹太郎、草野心平三位大家的推薦文字摘要。從本書的序文能夠看出，本書 7 位推薦人都跟陶晶孫生前有過較深的交往。這 7 位人物是：文學大家佐藤春夫，詩人草野心平，著名文學批評家小林秀雄、奧野信太郎和河上徹太郎、內山書店老板內山完造和享有“昭和棋聖”之稱號，稱雄日本棋壇數十年的旅日華人吳清源。

經筆者考證，在迄今為止中日兩國出版發行的《日本への遺書》的各個版本中，初版《日本への遺書》有一個絕無僅有的特色。說它絕無僅有，是因為讀者可以在版權頁上看到“創元社昭和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初版發行，發行者小林茂，印刷者松浦元”等初版信息之外，還能看到出版時貼上去的表示版權的“印紙”。就像一枚精美的小型張郵票，圖案為鰻，蓋有小篆體“晶孫”二字橢圓形朱印。筆者做過嘗試，但無論在考察 1963 年的“普通社版本”，還是 1995 年的“東方書店版本”，都沒看到這種蓋有“晶孫”字樣朱印的“印紙”。換言之，即只有初版《日本への遺書》，才是唯一貼有作者自製“印紙”並蓋有私印的陶晶孫著作。

儘管陶晶孫本人生前製作這些“印紙”的可能性極大，但提供給創元社却應該是作者的遺孀佐藤操女士，因為包括提起編輯出版《日本への遺書》這本作品集在內，事情都發生在作者逝世以後。

〈三〉有關初版本《日本への遺書》中的《序文》、卷首照片及《あとがき》

首先需要強調的是，縱觀在日出版的《日本への遺書》所有版本，發現收錄在《日本への遺書》初版本中的5篇《序文》和佐藤操的《あとがき》由於某些歷史原因，不再出現在其他任何一個版本之中。初版本卷首原有黑白照片三枚。第一枚是1931年在日本人辦的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工作時拍攝的陶晶孫工作照；第二枚是1943年與內山完造等人一起在現在上海魯迅公園旧址魯迅墓前的留影；第三枚是1929年跟郁達夫在上海的合影。這三枚照片由誰提供以及並未按照年代排序等問題尚有待續考，但有一點需要指出，迄今為止的三個日文版本，第二個版本、即1963年的普通社版發行時去掉了初版本里的三枚照片，第三個版本、即1995年東方書店版發行時只選留了初版本里的第一枚照片（另兩枚均屬後添加）。可見後兩個版本內容的選定出自編者之手，但編者後記里面都未言及其取舍的標準及原因。從某種意義上講，作為第一手陶晶孫研究資料，這些只存在於原始版本，後來重版或再版時被割舍掉了的5篇名人序、佐藤操親筆後記以及後兩張照片無疑都變得非常珍貴。

下面從《日本への遺書》這本書的出版緣起說開。

首先，初版本中佐藤操的《あとがき》提供了兩點線索。第一，出版此書並非出於作者本人生前意願。陶晶孫獲得日本永居資格後，對日本文壇的幾位知己談到過準備大量展開文學創作活動。他自幼多病，但就連既開過醫院也當過內科醫生的他自己也沒有預料到癌細胞的轉移會那樣迅速直至吞噬了他的生命。正如佐藤操在《あとがき》中所言，他不僅跟數家文藝刊物和報紙副刊簽了寫作協議，就連重點執筆的《郭沫若傳》，也是剛寫到一半就突然撒手歸西了。

陶晶孫藉口學術考察購往返機票攜家眷飛離台灣到東京，性質屬於“從那片沒有言論自由的土地脫逃，到據說有自由民主的日本安居”⁷。1946年陶晶孫赴台灣受命於民國政府，使命是到台灣從日本人手里接管台灣大學。台灣大學即國立台灣大學，在被民國政府接管之前，即日本統治時期的台北帝國大學，屬於日本國戰敗前包括韓國首爾的京城帝國大學在內的9所帝國大學中的一所。其師資主要來自日本本土。陶晶孫接收台灣大學以後就留在了該校任教並兼任熱帶研究所所長。誰知1949年以後，當時從中國大陸被派遣到台灣的一批“接收人員”開始受到嚴密的監視。然而，導致陶晶孫舉家逃離台灣的直接原因，是小兒子陶易王參加台灣學生運動上了當局的黑名單，被告知隨時有被抓捕坐牢的危險。由於當時沒有從台灣到大陸的途徑，加上事出緊急，只能先到妻子的祖國日本暫避一時。

在剛到日本的一段時間里，陶晶孫一直深居簡出，害怕因為沒有合法滯留簽證會被日本政府遣返回台灣，直至他蛰伏了將近大半年並且切身感受到了日本戰後的民主主義空氣，才正式提交了永居申請。這一點跟他生前的摯友、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時代的同事、日本著名大腦生理學家柘植秀臣的回憶基本相符⁸。關於陶晶孫日本永居簽證的申請，筆者還查到當時幫助他填寫有關英

7 佐藤操《あとがき》，1952年創元社初版《日本への遺書》第228頁。

8 參見柘植秀臣《追憶と業績》，1952年創元社初版《日本への遺書》第242頁。柘植在該文中第一次言及陶晶孫獲得日本合法永居簽證後對他興奮不已地談起過將來想回到中國大陸的計劃。筆者認為是一份至今仍然鮮為人知的研究陶晶孫思想結構的重要史料。

文材料並提交給當時統治日本的 SCAP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即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的那位日本友人，即著名社會活動家、新聞記者門屋博。這份永居申請，最後由麥克阿瑟親筆审批簽署後，於 1951 年初正式下達⁹。

第二點，關於《日本への遺書》的出版得到了哪些人士的幫助。

佐藤操在《あとがき》中記載：“本書の出版得到了東京大學倉石教授（筆者注：即漢學家倉石武四郎）和民科（筆者注：即民主主義協會）幹事柘植秀臣氏的大力援助和指導。此外，5 位先生（筆者注：佐藤春夫、河上徹太郎、吳清源、草野心平、内山完造）還專門寫了追悼文，生前好友陳少卿畫伯特意畫了封面並承担了本書的裝幀。”¹⁰

下面來看初版本中才有的 5 篇被佐藤操稱之為“追悼文”的名人序。

第一篇是佐藤春夫的《陶晶孫が遺著のために》。佐藤春夫屬於名震大正昭和兩文壇之巨擘，儘管日本戰敗初期在文壇猛烈清算戰爭御用文學的氛圍中有段時間日子難過，但這 5 人中無人文學成就能出其右，故佐藤序壓卷。除開佐藤春夫親筆作序提高了陶晶孫遺作的文學史地位這一點不論，這篇唯一出現在初版本《日本への遺書》之中的文章，無論對日本現代文學還是對日中比較文學來說，無疑都不啻一篇文史價值甚高的史料。

佐藤春夫在這篇序文里披露了兩件史實值得研究界注意。

第一件事是首次披露了跟陶晶孫初次相識的時間和地點。佐藤春夫自上世纪 20 年代就跟田漢和郁達夫保持文人交往，而且一直過從甚密。想必很早就從郁達夫口中聽說過創造社領袖人物郭沫若的連襟陶晶孫這個名字，作為小說家誰都不會放過郭沫若和陶晶孫那樣的中國人娶了日本妻而且生養了幾個“亞細亞之子（アジアの子）”的傳奇故事。但據佐藤春夫 1952 年的回憶，他跟陶晶孫的初次相識，是在 1944 年 5、6 月間。當時佐藤春夫到桂林戰地採訪歸國路過上海，內山書店老板內山完造“設專宴招待了”他和陶晶孫。佐藤春夫甚至認為其實那次內山完造完全是為了引見他跟在上海自然研究所的陶晶孫認識而設宴的。

這次會見的時間給研究者留下了較大的推測空間：同年 11 月，陶晶孫作為中國華中地區的文學家代表出席了日本文學報國會籌劃於當月 11 日至 14 日在南京召開的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一屆和第二屆大會都曾邀請過他參加却一概被他拒絕¹¹，那麼第三屆他為什麼會參加呢？筆者認為，陶晶孫無論作為文學家還是自然科學家，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特點，即素來極端回避政治。這種性格到了 1951 年從台灣逃到日本直至病故都無甚改變。如此性格的他不大可能主動參加在他去世後引起眾多猜疑與詬病的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身體多病這一點了解他的人可謂眾所周知。形式上由中方主辦的第三屆大會他完全可以稱病推掉，儘管他臨開會前在雜誌訪談時說了一些讓日方惱火的話¹²，但並沒有推辭參會。這又是為何？

筆者推測，這背後們會不會有讓他感到“難以推辭”的理由或隱情呢？也許跟當年初夏在上海跟佐藤春夫見面有關？佐藤春夫屬於以文學活動形式公開支持太平洋戰爭的“國策文學家”，不

9 參見門屋博悼文《東京の陶さん》，《歷程》第 41 号第 50 頁。麥克阿瑟 1951 年 4 月離任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之職。

10 參見佐藤操《あとがき》，1952 年創元社初版《日本への遺書》第 229 頁。

11 尾崎秀樹《近代文学の傷痕——旧植民地文学論》，岩波書店 1991 年。

僅作為“筆部隊”的一員幾度到前線戰地採訪，而且還公開發表過影響很大的電影小說《アジアの子》，歌頌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是為了“大東亞共榮”。佐藤春夫是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核心人物之一，這一點過去研究界幾乎無人提到。陶晶孫 1929 年在上海跟郁達夫過從甚密，他應該很早就比較了解郁達夫對佐藤春夫文學才華的崇拜。想必 1944 年初夏在上海也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跟佐藤見面的。儘管我們現在沒有發現任何資料能夠證實當時佐藤春夫和陶晶孫會見時的談話內容，但很容易想象當時佐藤春夫親自邀請陶晶孫參加幾個月後將在南京召開的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雖然前面兩屆大會的中日頭面人物武者小路實篤和周作人都不參會，但佐藤春夫應該會告訴陶晶孫，在會上能夠見到草野心平和尾崎秀樹等久違的文壇旧友。

再說陶晶孫自己也不知道是誰推薦自己上了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中方參會者名單。他在南京看到名單上自己的名字時十分震驚。陶晶孫從 1931 年就潛心從事自然科學研究而幾乎很少參加文學活動。了解這一情況又執意指名邀請陶晶孫參會的人物會是誰呢？鎖定這個人（或者兩個人）至少有兩個必須的條件。一是日本文學報國會的核心人物，二是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核心籌劃人物。根據筆者的推測，這位神秘人物是佐藤春夫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是草野心平。當時草野心平就在南京擔任汪精衛政權的宣傳部顧問。

佐藤春夫在他為《日本への遺書》作的序中還披露了另外一件史實，即日本東京的“三田文學會”（日本現代文學家重要團體之一）曾經邀請陶晶孫出席過一個座談會，而且是佐藤春夫本人親自向陶晶孫發出的邀請。據佐藤春夫回憶，當時陶晶孫接受邀請提了一個條件，即“免談政治”。

筆者查閱了 1951 年 7 月發行的《三田文學》（41 卷 3 號，三田文學會），發現該刊第 58 頁里只是粗略記載了佐藤春夫言及的那次“座談會”的召開情況。出席者為佐藤春夫、奧野信太郎、竹內好和丸岡明，加上嘉賓陶晶孫共 5 人。按照當時的說法，正式稱謂為“陶晶孫氏を囲む座談會”¹³。

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佐藤春夫在這次座談會上對陶晶孫說自己想寫郁達夫，想請陶晶孫提供素材時，陶晶孫的回答非常曖昧。陶晶孫應該了解好友郁達夫跟佐藤春夫二人戰前的特殊關係和 1938 年佐藤創作小說《アジアの子》所造成的友情徹底決裂¹⁴。儘管 1938 年以後陶晶孫一直跟郁達夫失去了聯繫，但他不可能對郁達夫於 1945 年被日本憲兵暗殺在蘇門答臘的風傳聞所未聞。在他看來，佐藤春夫說的那些話屬於對他自己支持侵華戰爭行為的一種懺悔和自我救贖，所以只模稜兩可地說了一句：“日本這邊有人寫郁達夫，那是件好事啊！”

12 1943 年 11 月 1 日雜誌《文友》（1-12）載文《文學對談》，披露陶晶孫對內山完造說：“前兩次大會出席者都是些沒用之人，所以開會也沒什麼用”。此外，一個月後他又在同一刊物《文友》（2-2）上說：“我在南京看到名單，華中地區我跟張資平兩個老的名字排在前頭。可是我們參會也不起作用啊。又不是敬老會。所以啊，還是讓搞政治的人參加的好”。

13 參見《三田文學》41 卷 3 號第 58 頁，三田文學編輯部編，三田文學會 1951 年 7 月出版發行。

14 1938 年 3 月號《日本評論》刊載佐藤春夫電影小說《アジアの子》。描寫郭沫若歸國後抗日激情消退，“翻然理解了皇軍開發華北的真意”之後最終放棄抗日，由“昨日的抗日急先鋒轉向變成了親日派”，而郁達夫却被寫成身負秘密使命的間諜，在促成郭沫若逃離日本之後，不僅用從蔣介石那里領取的巨額懸賞買走了郭家祖上的土地，還將北伐時期郭的情人霸占為妾。同年 5 月，郁達夫在武漢發表《日本的娼婦與文士》一文，以牙還牙反唇相譏佐藤“平時却是假冒清高，以中國之友自命”，但實際上却是“軍閥的走狗文士”，比中國“最下流的娼婦還不如”。自此二人多年友情決裂。

經筆者考察，佐藤春夫於 1945 年 10 月隱居在長野縣深山寫下廣播稿《呼唤舊友》，並送交日本國際廣播電台於同年歲末向海外播出。該稿才是他最後一篇提到郁達夫的文字。1951 年三田文學會召開“陶晶孫氏を囲む座談會”之後，關於郁達夫他並未寫下任何文學作品或其他文字。儘管這裡面包含有多種可能性。但至少不應排除陶晶孫未向他提供有關郁達夫的素材這一因素。

筆者認為，應該把陶晶孫出席那次三田文學會舉辦的座談會視為 1951 年陶晶孫決定以文學家身份在日本正式展開活動的一個標志。當時他恢復文學創作活動所抱的態度是拒絕或遠離政治。從中我們可以把握他晚年文學創作背後的複雜心態。

至於言及陶晶孫的中日文作品，佐藤春夫的這篇序，可謂絕頂的贊辭。例如，他提到《淡水河心中》時，不但稱贊其“文體的新穎和兼有自然科學家和詩人二者的獨創性構思值得尊重”，還發自內心地惋惜再也看不到陶晶孫那種“充滿苦澀諷刺和幽默的針對日本的善意文明批評”。

收在日文初版本《日本への遺書》里面的 5 篇名人序中，除了佐藤春夫的《為陶晶孫先生之遺著而作》之外，還有內山完造於 1952 年 8 月 25 日寫於九州最北端門司的《寒山詩の味》值得一提。

就現代日中文學文化交流而論，內山完造明顯屬於橋梁性人物。盧溝橋事變以前，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今山陰路）11 號的內山書店不僅是大批日本文人和接待魯迅傾慕者的窗口，同時也是中國留日歸來的前後幾批著名文人的匯聚地點。內山完造本人，20 年代末期也曾多次幫助魯迅和郭沫若躲過國民黨的秘密抓捕。

陶晶孫跟內山完造的交往始於 1928 年 2 月他携家眷從東京回到上海之後。由於平時去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上下班乘坐班車的指定站點就設在距離內山書店門前不遠的地方，所以他經常光顧內山書店買書或跟文人朋友們約見¹⁵。1931 年陶晶孫到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工作以後，跟內山完造的關係變得更加密切。佐藤春夫、河上徹太郎、草野心平以及佐藤俊子等一大批日本文人幾乎都是在那段時期里由內山完造引見並保持交往的。

內山完造在序文《寒山詩の味》中特別提到了陶晶孫的幾段鮮為人知的經歷，為不斷充實完善中國現代文學史提供了難能可貴的資料。

第一段經歷是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在上海作為創造社成員創辦木偶戲劇團和跟劇作家夏衍一起成立藝術劇社向國內介紹西歐近代戲劇；第二段經歷是 45 年日本戰敗投降後任國軍上校軍醫負責接管南京日本陸軍醫院；第三段經歷是後來受命到台灣出任台灣大學熱帶病研究所所長。最後是有關陶晶孫 1951 年受聘東京大學中國文學講師以及授課的情況。

根據迄今為止發掘出來的史料來看，內山完造所言及陶晶孫的四段經歷，第一段中國國內留存的有關資料非常詳細而內山提到的只屬皮毛；第二段經歷筆者參照 1992 年第 4 期《新文學史料》所刊載署名陶瀛孫（陶晶孫胞妹）和陶乃煌的《陶晶孫小傳》並進行了核實，確認了 1945 年抗戰勝利後被派到南京去接管日本陸軍醫院的事實，但有兩點需要補充和修正。

第一點，《陶晶孫小傳》發表於 1992 年的中國大陸，陶晶孫家屬或許出於某種原因在文中有意回避寫明當時赴南京究竟受命於何人。日本投降後委派一批國軍軍官對日軍在華機構進行接管

15 內山完造《憶陶晶孫先生》，《歷程》第 41 號第 48 頁。

的只能是國民黨政府。而陶晶孫受聘的日本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於 1945 年被中方接管之後，他馬上改變了身份，受命參加或主持接管了兩個日本人統治的機構。首先是南京日本陸軍醫院，然後是台北帝國大學（接管後改名為台灣大學，並非過去國內不少文章所說的“台北大學”¹⁶）。在這個問題上需要修正的是，當時接受國民黨政府指令主持南京日本陸軍醫院接管工作的應該是當時的東南醫學院院長郭琦元，陶晶孫只是郭點的將，屬於參與行為。另外，1945 年日軍投降後陶晶孫受命接管日本的一些機關設施屬於有證有據的史實，但當時民國政府是否對他授以上校軍銜，尚有待考證。內山完造提到的“任國軍上校軍醫負責接管南京日本陸軍醫院”雖然跟陶晶孫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時期的同事柘植秀臣在《追憶と業績》中的表述如出一轍，但皆屬於“傳聞”轉述。

此外，內山完造披露的第四段經歷亦屬於至今尚無人知的情況，筆者判斷亦當屬珍貴史料。內山文中提到陶晶孫受聘東京大學講師講授中國文學課程，開課第四天見到內山完造時說：“老板，我看來是快要被自然免職了。開課第一天來了三個學生聽課，第二天變成了兩個，第三天只剩下一個，今天結果一個人影兒都沒了……”¹⁷。至少說明了一點，即在戰敗不久的日本，哪怕是東京大學這樣的日本最高學府，學生們對中國現代文學尚無多大興趣。

內山完造於 1945 年日本戰敗後回到日本。在他的後半生里主要從事民間日中友好活動。50 年代還擔任過日本日中友協理事長。他是在九州的門司作巡回講演時接到電報獲悉好友陶晶孫突然病故的。感觸甚多的他當時就寫下了悼念文章《寒山詩の味》，同年 10 月出版《日本への遺書》時，便將此文作了序。

最後讓我們來看收錄在初版本《日本への遺書》最後一篇文章《追憶と業績》。

根據前文所示初版本《日本への遺書》目次，可見內容可分為三大部分。第一是名人序；第二是陶晶孫原創作品；最後部分專門辟為“追憶”。“追憶”部分總共收了 5 篇文章，按順序各篇題目為《あとがき》（佐藤操，1952 年 9 月作）、《父陶晶孫の思出》（內含三篇。作者分別為：陶棗士、陶方之和陶伊凡，1952 年 9 月作），末篇是《追憶と業績》（柘植秀臣）。

柘植秀臣是日本著名神經生物學家和腦科學家，跟陶晶孫有着近 30 年的友好交往。柘植早年跟有社會主義思想傾向的社會活動家尾崎秀實和陶晶孫胞弟、腦科學家陶烈交往甚深。1937 年柘植受聘於日本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又成為陶晶孫的同事。直至陶晶孫病逝，二人可謂莫逆。

柘植秀臣的《追憶と業績》雖然沒有留下具體的寫作時間，但從其中相關文字來看，屬於專門為紀念好友和籌劃出版遺作而作，這一點可以說毫無疑問。根據悼文《追憶と業績》，我們不難判斷出編輯日文初版本《日本への遺書》的人是柘植秀臣，而不是陶晶孫的遺孀佐藤操¹⁸。《追憶

16 國立台北大學前身為省立行政專科學校、行政專修班以及“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創校於 1949 年。2000 年改制為現今校名。國立台灣大學前身則是 1928 年日治時期創建的台北帝國大學，1945 年台灣光復後改成台灣大學。

17 參見內山完造序文《寒山詩の味》，1952 年創元社初版《日本への遺書》第 10 頁。

18 柘植秀臣寫道：“對於陶晶孫，我們有過那么多的期待。我現在着手整理他的遺稿，就是為了想讓更多的人能讀到他為了中日友好而寫給日本人看的文章”。參見《追憶と業績》，1952 年創元社初版《日本への遺書》第 239 頁。佐藤操因為寫了《あとがき》，故容易被誤解為該書的編者。不過，伊藤虎丸在他為 1995 年東方書店版《日本への遺書》寫的《解題》（該書第 238 頁）中透露曾“聽說當時陶晶孫遺孀也都參與了編輯”。

と業績》内容可分為兩大部分。一是對有友人的沉痛悼念；二是對友人畢生從事自然科學研究成就的整理¹⁹。

我們根據《追憶と業績》得知，柘植秀臣跟陶晶孫胞弟陶烈同行，曾經都是日本帝國大學專攻腦科學和神經生物學的高材生。柘植畢業於仙台東北帝國大學，而陶烈則是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後轉入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精神病學研究室三宅礦一教授門下的博士生。陶烈在校期間就以跨學際研究聞名，他對醫學和哲學社會科學的綜合研究讓他確立了辯證唯物論這一科學方法論在人腦活動研究中的指導地位，為此而震動了日本醫學界²⁰。陶烈只比柘植年長4歲，加上東京帝大博士課程未畢業，按常理柘植應該稱他為“先輩”。然而，柘植一直稱陶烈為“先生”，可見對其之景仰程度。1927年10月，陶烈專程從東京到仙台探望正在東北帝國大學攻讀博士課程的家兄陶晶孫，柘植秀臣聞訊趕來問候，通過陶烈結識了陶晶孫。對於九州帝國大學畢業的“大先輩”陶晶孫，柘植雖然事前略有所聞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但相見之後給他留下的強烈印象却是一位“溫和的人道主義者”。

在《追憶と業績》中，柘植秀臣還直言不諱地披露了他對陶晶孫性格發生重大轉變的看法，筆者認為這一點尤其值得引起研究界的重視。柘植這樣寫道：“陶氏兄弟二人雖然性格迥異，但卻親密無間。1930年陶烈出差到東京時突然病故，這對當時在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從事衛生學研究的陶晶孫來說，無疑是一次難以承受的精神打擊”。按照柘植的觀察推斷，體弱多病而且性格極端溫和的陶晶孫，“突然變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關注社會矛盾，無疑是從親自整理弟弟陶烈的遺稿那段時間開始的”²¹。

說到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時期的陶晶孫，作為同事的柘植秀臣說陶晶孫跟他由於“專業不同，加上自己不大懂他的文學，故交談時話題大多圍繞已故的陶烈”。然而，在柘植看來，陶晶孫“仍然不屬於那種獻身於革命的性格剛毅的人，而是一名誠實厚道的人道主義者”。儘管如此，但“他創作於上海時代的幾篇文學作品，還是以他獨特的幽默諷刺的方式批評了日本人的非文化，表達了他憎恨侵略戰爭的思想情感和對軍國主義日本的抵抗”²²。

〈四〉普通社版《日本への遺書》所收作品與創元社初版之內容比較

任何人只要細心，都可以在199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一版發行的《陶晶孫選集》（丁景唐選編）第422頁編後記中讀到以下文字：

“1952年2月12日陶晶孫在日本市川病故。日本友人於1952年10月將他的日文作品編為

19 這種整理分為《年譜》和《陶熾（晶孫）研究業績》兩個部分。欲知詳細，可查閱《日本への遺書》第243頁-245頁，在此不贅述。

20 關於對陶烈專業水平的評價定位，筆者參考了日本精神病学第一人、前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精神病學研究室主任教授三宅礦一博士為《陶烈論文集（第一）》作的序。

21 《陶烈論文集（第一）》，陶熾編，東京同仁會昭和8年9月30日發行。筆者在考察過程中發現此書中的陶熾序，此文當屬迄今為止尚未發現的陶晶孫佚文。文中涉及到該書的編輯過程和對陶烈日文論文的翻譯等等重要信息。由於與本文關係不大，故日後待機另作發表。

22 柘植秀臣《追憶と業績》，1952年創元社初版《日本への遺書》第241頁。

《給日本的遺書》，由創元社出版，1963年5月，又由普通社增訂再版”²³。

其實，《陶晶孫選集》一書的編輯丁景唐並非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而是從上海文藝出版社退休的老編輯。丁老先生生於1920年，後半生主要從事魯迅、瞿秋白、“左聯”五烈士和左翼文藝運動史的研究，歷任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第一、二屆副主席。丁景唐作為文學編輯的最大成就即主持編輯出版了《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丁老先生雖然三、四十年代活躍於上海，但並不認識陶晶孫本人。據該書編後記，擔任《陶晶孫選集》的編輯，是受陶晶孫之胞妹陶瀛孫以及陶晶孫遺孀陶彌麗和孩子們之托，要求“恢復陶晶孫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²⁴。當時陶晶孫的遺屬給丁景唐提供了一批日文原書和大量的回憶性資料手稿。前面言及的日文初版《日本への遺書》，應該是這批資料中的一本。而且，以上從“編後記”中引用的部分有關日文版《日本への遺書》出版信息的文字，其實源自陶晶孫之子陶乃煌的《譯後記》²⁵。丁景唐先生不懂日文，應該無法直接從日文資料中轉錄相關信息。陶乃煌所說的“由普通社出了重版本”和丁景唐言及的“由普通社增訂再版”究竟有無出入，有多大的出入，只有親眼目睹了1963年日本普通社出版的原書之後才能得到正確的結論。

然而，《陶晶孫選集》作為新中國成立以後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陶晶孫作品集，或許是為了顯示作品的原創性，只從日文版《日本への遺書》里收錄了5篇（《一年間》、《留守日記》、《日本見聞記》、《為了中日友好》、《革命與文學》），而且皆為陶乃煌之譯作。換言之，即在日文版《日本への遺書》於2008年8月由上海譯文出版社翻譯出版之前，對大陸的讀者來說，日文版《日本への遺書》的內容依然不被人知，除了被翻譯收錄在《陶晶孫選集》中的那5篇作品以外，究竟還有些什麼內容無從知曉。

那麼，前文提到的“普通社出的重版本”究竟收錄了哪些作品呢？下面我們來看目次。

【Ⅰ】

少年時代の思い出

初めて汽車に乗った話

【Ⅱ】

セントラルサプライの泥棒

漢文先生の風格

淡水河心中

【Ⅲ】

日本見聞記

日本に住む楽しさ

近頃の日本

中日友好のために

23 《陶晶孫選集》（丁景唐選編）第422頁，1995年5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一版發行。

24 同前書第420頁。

25 丁景唐將陶乃煌手寫的《譯後記》轉載於自己寫的《編後記》（同前書第431頁）中。陶乃煌提供的相關文字跟丁景唐轉述的文字似有出入，現摘錄如後：“1952年2月，陶晶孫逝世後，由彌麗夫人与日本友人為他的日文遺作編了一本《給日本的遺書》，同年10月由創元社出版，1963年5月由普通社出了重版本”。

落第した秀才・日本

革命と文學

〔IV〕

弱蟲日記

曼殊雜談

〔V〕

黃言集

一年間

身邊雜記

箱根遊記

蘭花の變り咲き

入院記

〔VI〕

ブシュキン・ゴルキー・魯迅

周作人と魯迅

昔話

藤村雜記

烹齋雜筆

〔VII〕

中國の諺によせて

蘇曼殊の再登場と漢文

蘇曼殊と逗子

久米氏と竜宮に遊ぶ

追憶と業績 柘植 秀臣

陶晶孫の人と作品 須田 禎一

接下來，讓我們來對前文所列出的 1963 年普通社版和 1952 年創元社初版《日本への遺書》的收錄作品進行一番比較。

首先我們會注意到普通社版沒有序，此乃其一。其二，陶晶孫的作品有很大部分並未遵循初版本的分類進行編排，而是根據新編者的意圖進行了大幅度調整。其三，僅就陶晶孫作品而言，普通社版本里增添了《中國の諺によせて》《蘇曼殊の再登場と漢文》《蘇曼殊と逗子》《久米氏と竜宮に遊ぶ》4 篇初版本里沒有的原作。其四，收在創元社版中的《揆撈》《依怙地》《進貢婦朝》《危邦より乱邦へ》《好きと云うこと》《松林の亭子》6 篇作品不再收入普通社版之中。

此外，兩個版本後記部分內容也大不相同。普通社版徹底刪除了陶晶孫四位遺屬的回憶錄和出版後記，整個後記部分只有兩篇。一篇是從初版本中保留下來的柘植秀臣的《追憶と業績》，另一篇則是編者須田禎一自己的長篇編後記《陶晶孫の人と作品》。從所收錄的原作者作品的數量上看，初版本收陶晶孫原作 32 篇加上序文 5 篇和後記 5 篇總共 42 篇，而普通社版本則只收錄了原作 28 篇和 2 篇後記共 30 篇。新版所收錄內容總數竟少了 12 篇之多！毫無疑問，這種取舍添加反映了編者的價值觀，例如編者須田大膽將初版本里的 5 篇名人序和點評及作者遺屬的文章全部

割愛刪除的做法，完全可以理解為其目的在於凸顯陶晶孫原著的原始風貌。但與原始版本相比，作者原作品畢竟少了 6 篇。不能說沒有留下某種遺憾。

〈五〉普通社版與創元社版的不同及版本變化的原因

日本普通社 1963 年 5 月 30 日出版發行的日文版《日本への遺書》也許由於發行量太少的緣故，日本國內別說地方公立圖書館，就連國立公立大學圖書館也極少有收藏。

當筆者第一次將這個版本拿在手中的那一瞬間就發現了它變成了“新書判”。所謂“新書判”，指“103mm×182mm”這個尺寸。前者為左右寬度，後者為上下長度。初版本《日本への遺書》為“一般書籍判”，尺寸為“128mm×182mm”，且套有硬壳，故“新書判”的普通社版本的外觀感覺小而細長。此乃其一。其二是藍白兩色軟封皮，且無插畫以及圖案裝飾，僅從裝幀來看，跟考究的初版本相比，顯得大為遜色。

接下來翻開扉頁，讓人驚愕不已的是初版本刊載的三枚極為珍貴的照片都被統統撤掉了。整本書里沒有一枚照片和圖片。作為研究者，難免好奇心頓生。為何會有如此大的版本變化？發生變化的原因又是什麼？

無論是書名《日本への遺書》，還是作者名字陶晶孫，兩個版本完全一致。查版權頁上的文字，發行所為“株式會社普通社”，地址是“東京都中央區日本橋江戸橋 1-9”，發行者名字為“八重樫昊”，印刷日期為“昭和 38 年 5 月 20 日”，發行日期為“昭和 38 年 5 月 30 日”。雖不見有“第 × × 次印刷”的字樣，亦不敢斷定為普通社的初版。因為如果是該社發行的初版本，必定會注明“× 年 × 月 × 日初版”字樣。故只能斷定為普通社出版發行的第一個版本。然而，這個版本究竟跟創元社的初版本是一種怎樣的關係呢？

筆者想到了兩種可能性。第一，普通社跟創元社原為一家，只是因故更改了出版社的名字，故無必要標注“普通社 × 年 × 月 × 日初版”字樣。第二，陶晶孫遺屬跟創元社發生了矛盾，中止了原來的出版協議，改交普通社重新出版。版本視覺上明顯的變化即為了借以區別創元社的原始版本。

關於《日本への遺書》的第二個日文版本為何改版為“新書判”的問題，筆者在刊登在普通社版《日本への遺書》版權頁前面的一小則題為“關於《中國新書》的刊行”的出版社告示中得到了答案。

原來，出版“中國新書”系列叢書，是普通社早在 1960 年秋天就擬定的計劃。而且以委托研究的形式直接將《日本境內的中國》這一共同研究課題下達給了安藤彥太郎、飯倉照平、今井清一、尾崎秀樹、竹內好、新島淳良、野原四郎、野村浩一、橋川文三、藤田省三、光岡玄、矢澤康祐、山田豪一和京谷秀夫共 14 名當時日本國內著名的中國學研究者。這批學者為此成立了“中國之會”，還定期發行小型雜誌《中國》，夾在每本“中國新書”系列叢書里作為附錄²⁶。也許是出

26 据普通社當時的編輯田邊貞夫回憶，這本雜誌的撰稿人是竹內好，編輯主要由竹內好、橋川文三和尾崎秀樹三人負責。參見本文注 28。

於避嫌，普通社還特意聲明，“中國新書”叢書的出版既非直接針對當下日中關係的各種動向，亦不屬於針對中國的任何黨派活動，不過是百姓希望日中友好相處之意願的反映²⁷。

關於1963年普通社版《日本への遺書》的出版情況，筆者首先仔細查閱了該版本編者的文章《陶晶孫の人と作品》，作者是著名翻譯家兼文學批評家須田禎一。然而令人失望的是，編者須田這篇感人的回憶錄及對陶晶孫文學的賞析解讀竟然只字未提到該書編輯以及成書緣起和出版過程。讓這本書納入“中國新書系列叢書”的人究竟是誰？為什麼要指定須田禎一來編？選編陶晶孫作品的取舍標準是什麼？這些疑問讓人一頭霧水。

伊藤虎丸在後來東方書店版《日本への遺書》的《解題》中斷言普通社版本是“‘中國之會’那批人編的”，筆者認為此斷言似缺乏根據或曰欠準確。作品的取舍及分類，原作以外收錄些什麼文章等等原始方案完全有可能是須田禎一提出來的。但事後肯定經過了“中國之會”14名成員的審定。須田禎一當時並非“中國之會”成員，故不可能也不具備資格向普通社推薦將陶晶孫的作品集納入“中國新書”系列叢書。筆者推斷，充當這個至關重要角色的人物，竹內好的可能性最大。竹內好雖然年紀比須田禎一小兩歲，但早在30年代郭沫若亡命日本時期就已經是日本中國文學研究會的領袖人物。他不但是跟陶晶孫有過深交的“中國之會”主幹成員，而且對其文學有着高度的認同。

然而，筆者最近有緣讀到了另外一份資料，即60年代普通社編輯田邊貞夫先生題為《熱っぽい著者の息吹》的回憶錄²⁸。這篇業內人士撰寫的文章不僅提供了1963年日本普通社計劃出版“中國新書系列叢書”的背景材料，還首次披露了當時發生的“普通社倒閉事件”。

據筆者調查，普通社下達給“中國之會”14名研究者的共同研究課題於1963年初見成效，推出的第一批成果是6冊一套的“中國新書”系列。筆者在大量查閱史料過程中，根據當時在普通社編輯部工作的田邊貞夫回憶得知，這套叢書在1963年這一年里陸續發行完畢，陶晶孫的《日本への遺書》印好之後，其中沒來得及出廠的那部分全部被換上了印有“勁草書房發行”字樣的腰封。導致了當時市面上銷售的同一圖書，一部分標注為“普通社發行”，另一部分則標注為“勁草書房發行”的奇怪現象。

現將這套“中國新書”系列叢書各冊信息（書名、作者名及出版時間）按照叢書編號順序排列如後：

- <中國新書1>：竹內好《現代中國論》（1963.2）；
- <中國新書2>：宇都宮德馬《日中關係の現実》（1963.3）
- <中國新書3>：尾崎秀樹《近代文學の傷痕：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その他》（1963.2）
- <中國新書4>：陶晶孫《日本への遺書》（1963.5）
- <中國新書5>：武田泰淳《わが中國抄》（1963.6）
- <中國新書6>：佐佐木到一《ある軍人の自伝》（1963.6）

由此看出，陶晶孫的《日本への遺書》的第二次出版，是該書編者作為研究成果交給普通社，

27 參見普通社1963年5月出版《日本への遺書》第254頁。

28 田邊貞夫此回憶錄初出月刊《エディター》1978年11月号，後來收入單行本時加上了標題《熱っぽい著者の息吹》。

並將之納入“中國新書”系列叢書正式出版的。並非陶晶孫遺屬中止了跟創元社的出版協議將原作交給普通社另行出版。

田邊貞夫的回憶錄還為我們解答了為什麼普通社出版的《日本への遺書》一部分腰封上印有“勁草書房發行”字樣的疑問。原來當時的普通社屬於日本出版界巨頭平凡社傘下的一家小出版社。這家出版社的出版事業發展方向是向日本國內介紹社會主義中國的有關信息和發展狀況。為此當時擁有一批知名的漢學家和作家隊伍。然而，自60年代初經營就不大穩定。到了1963年夏天，數年來過分投資漫畫雜誌造成了巨額虧損這件事終於惹惱了總公司平凡社。於是平凡社下令讓普通社於年內停止全部出版業務。包括正在出版和印刷中的出版物在內，沒交付市場流通的全部移交給另一家平凡社下屬子公司一勁草書房。在普通社編輯部擔任編輯工作的田邊貞夫本人，也被調到勁草書房任職²⁹。想必作為“中國新書”系列中第4冊出版的《日本への遺書》當時還有一部分沒有納入圖書市場流通，而這批書被移交給勁草書房之後，便被換了一條印有“勁草書房發行”字樣的腰封，整個書的內容和大體上的裝幀都沒有變化。筆者收藏的尾崎秀樹《近代文學の傷痕：大東亞文學者大會・その他》（中國新書3）的情況也屬於同種情況。版權頁註明的發行所原為“普通社”，同樣被貼了一張印有“勁草書房”字樣的小紙條。

〈六〉東方書店版《日本への遺書》

日本（東京）東方書店1995年出版的《日本への遺書》是目前該書日文最新的版本。查該書版權頁，出版日期為1995年7月30日初版第一刷發行，著者陶晶孫，發行者福島正和，發行所株式會社東方書店。

東方書店為何在1995年重新出版《日本への遺書》（明文標注為“初版”，應該意味着與過去的所有版本沒有版本延續關係），該書的《解題》以較大的篇幅做出了甚為詳盡的說明。

東方書店版《日本への遺書》中目次最後一項是《解題》，作者乃近幾十年來日本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卓有成就的學者之一伊藤虎丸。文章雖然未注明寫作時間，但從內容上判斷，應該是在這本書臨出版之前，即1995年夏天。跟前面兩個版本的明顯區別是，這本書的《解題》辟有一節專談“本書的出版企劃及編輯”，體現出作者治學之嚴謹。

下面對“本書的出版企劃及編輯”的內容進行概述³⁰。親自參與編輯出版的伊藤虎丸披露出當時的事實。為了節省篇幅，筆者將之歸納為兩點。

第一，關於本書出版的緣起。

1995年恰好時值所謂“日本戰後50周年”之際。同年3月，伊藤在某一次聚會上對東方書店老板神崎勇夫主動提起，近來大學中國現代文學講義所用的陶晶孫日文作品選集由於老版本絕版的原因無法買到，希望有出版商再出版一次，沒想當場就得到了神崎老板的欣然應允，答應由東方書店來出版，而且說要爭取趕在8月15日那個紀念日子之前跟讀者見面。

29 同注28。

30 伊藤原文出自《『解題』戰後五十年と『日本への遺書』》，《日本への遺書》第236～239頁。後文中的轉述出處相同，不另注。

第二，出版計劃先由東方書店擬定，然後經出版社責編輯朝浩之、陶晶孫遺屬和出版倡議原始提案者伊藤虎丸三方協商，最後製定出編輯方針。

關於當時初定的編輯方針有以下四條。

一，為了配合戰爭結束 50 周年的紀念活動，爭取紀念可能保留初版本所釋放的 20 世紀 50 年代的時代氣息，故決定在作品編選上以 1952 年創元社版為藍本。

二，刪去初版本卷首 5 篇名人序和卷尾全部非作者原創文章，包括陶晶孫遺孀的《あとがき》，三位公子聯名寫的回憶錄以及作者生前知己柘植秀臣撰寫的《追憶と業績》，委托三位公子推選一位代表重新寫一篇怀念父親的文字。

三，鑒於初版問世半个世紀以來讀者层面變化巨大，因而有必要向讀者介紹本書的背景及作者，故決定責成學者伊藤虎丸撰寫 8 千字左右的序文置於卷首，並重新整理出作者年譜附在卷尾，文章要簡明平易。

四，只要 90 年代的讀者能夠閱讀，除了個別新字體以外，盡可能保持初版本的字形及標注風格。

然而，我們根據東方書店版《日本への遺書》反觀出版當時的編輯方針，發現在實際編輯過程中對預定編輯方針的第二條和第三條作了較大的修正。而認同這種修正的，正是主要該書編輯負責人伊藤虎丸。例如，原計劃不再收錄作者遺屬發表在初版本上的全部追悼文章，而“委托三位公子推選一位代表重新寫一篇怀念父親的文字”。而實際上收錄了陶晶孫長子陶棣土和三兒子陶伊凡（新版中改為“陶易王”）的兩篇文章。置於卷首的陶棣土文屬於 1995 年重新撰寫，不僅字數多了一倍，題目也由初版的《父陶晶孫の思出》改為《父を憶う》。問題是陶伊凡的文章《父陶晶孫の思出》，不僅題目沿襲初版本，整個內容完全與初版相同，文尾都註明了出自 1952 年 2 月 20 日發刊的《歷程》（陶晶孫追悼号）。至於為何非要顧既定出版方針而收入兩篇作者遺屬的同類文章，學者伊藤虎丸稱他曾力爭保留 1952 年創元社初版原貌而未獲準。陶伊凡的回憶文章之所以能夠被保留下來，是因為編者伊藤虎丸將該文界定為“準原作”並得到了出版社的認可。

對原計劃第三條的更改主要指編者伊藤虎丸的《解題》和《年譜》。前者改為置於卷末是因為文章太長而不宜置於卷首，而《年譜》則是因為執筆者伊藤虎丸沒能按期“重新整理出”來，為此他在《解題》中特意言及並致歉。

最後略微提及東方書店版《日本への遺書》卷首插圖及內容。

首先，東方書店版本卷首亦收入了照片三枚。第一枚跟初版本相同，即陶晶孫在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研究室里拍攝的本人照片；另外兩枚則是東方書店版本首次採用。一枚是陶晶孫跟劇作家夏衍在上海藝術社第二次公演《西部無戰事》時並肩站在劇院門口廣告牌前的合影，時間是 1930 年；另一枚則是陶晶孫在東京跟《歷程》雜誌同人“耳朵之會”的留影，拍攝時間是 1950 年秋天，地點是東京的某一家小酒館。照片上除了陶晶孫以外有 12 個人，他們的名字排列如後：川鍋東策、三井直麿、辻誠、松方三郎、草野新平、串田孫一、宇佐見英治、伊藤照光、坂本德松、西田義郎、鳥海迅彥、藤島宇內。

這枚照片之所以珍貴，是它揭示了兩個問題。其一是陶晶孫 1950 年 3 月逃出台灣到日本避難到翌年初春拿到 SCAP 簽發的在日永居簽證這段時間，基本上屬於“隱居”的生存狀態。這枚照

片告訴我們，陶晶孫的“隱居”，事實上不針對當時的日本文學界。其二，照片上陶晶孫笑容可掬，跟文學界的朋友們談得甚是投機，看不出他身懷絕症。

關於東方書店版《日本への遺書》的內容，儘管伊藤虎丸作為該書的編者明確提到了“盡量保持初版風貌”，筆者還是發現了些許不同於初版本的地方。例如目次跟各章節副標題的不一致。初版本各章節題目凡是有副標題的，在總目次里面都被省略去了，而在95年東方書店版本里面，總目次跟各章節標題及副標題完全一致。至於各篇作者的原著作品，除了為了適應90年代的讀者而將旧字體改成了新字體以外，其他沒有任何出入。63年普通社版本里增添的那4篇（《中國の諺によせて》《蘇曼殊の再登場と漢文》《蘇曼殊と逗子》《久米氏と竜宮に遊ぶ》）初版本里没有的原創作品，都未被納入東方書店版《日本への遺書》之中。

〈七〉關於中文版本《給日本的遺書》

《日本への遺書》的中譯本，迄今為止只有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的《給日本的遺書》一個版本。

本書以“編者後記”的形式在卷尾收入了一篇署名高建國的文章，題為《奇人與奇書—陶晶孫及其『給日本的遺書』》。此文後面特意加有一條“編注”，說“本文並非日語原版中的文章，為使讀者全面了解陶晶孫其人，故收入中譯本”。

此文作者高建國在文中披露了“《日本への遺書》第一個中譯本”的出版籌劃、翻譯以及出版計劃的擬定過程。

首先，出版《日本への遺書》中譯本的提議最早由陶晶孫之胞妹陶瀛孫提出，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多年來一直沒有出版社願意接受。所謂“種種原因”，不外乎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對陶晶孫的定性造成的阻礙。陶晶孫由於歷史問題直至90年代一直背着三大“文化漢奸”嫌疑。第一是在日本佔領上海時期的1931年至1945年期間曾受聘於日本在華“細菌研究基地”—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任研究員，第二是1944年作為中國作家（華中地區）代表參加了於南京召開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並當選為大會執行副主席。第三是接受周作人邀請就任汪偽政府下的“中日文化協會事務局長”。這個嫌疑直至共產黨文化領導人之一夏衍90年代中期親自出面作證為陶晶孫平反，證明當時上海地區共產黨地下工作領導人潘漢年曾告訴過他陶晶孫是共產黨安插在上海淪陷區的“臥底”，陶晶孫的“漢奸”嫌疑才算被徹底抹去。

中學教師陶瀛孫於2003年去世之後，她的學生高建國於2005年抗戰勝利60周年之際撰文詳述陶晶孫非凡生平及其《給日本的遺書》，在著名文藝理論家王元化先生的幫助下於香港《文匯報》分章連載，自此引起較大反響。

199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出版《陶晶孫選集》時，夏衍在序中在此公開為陶晶孫平反昭雪。自此以後，中國大陸對陶晶孫的定位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換言之，也就是在這種徹底改變了的“新語境”下，上海文藝出版社於2008年正式擬定了《日本への遺書》第一個中譯本出版計劃。至於本書的譯者，陶瀛孫弟子高建國在卷尾文章中提到“散文不好翻譯”，王元化曾“建議先找一個合適的譯者”。王元化先生早在該中譯本出版之前就已謝世，故曹亞輝和王華偉二位譯者，應該都是

高建國物色的人選而不大可能是高氏本人的化名。

儘管中譯本《給日本的遺書》里面未見任何文字言及翻譯時選用的是哪一個日文版本，但根據它的目次內容，不難判斷所用的日文版本即 1995 年東方書店版《日本への遺書》。除了《淡水河心中》這篇堪稱陶晶孫晚年代表作的小說不知為何被刪去，以及增加了一篇高建國面向中國讀者的解說文字以外，其他作品包括陶棗土的《懷念父親》、陶易王的《回憶父親陶晶孫》以及伊藤虎丸的《解題》，皆被原封不動地被翻譯成了漢語。

儘管我們從高建國的解說文字中得知迄今為止唯一的中譯本《給日本的遺書》（曹亞輝、王華偉合譯）從籌劃到出版好事多磨，幾經周折，但筆者仍然為此中譯本感到一絲遺憾。因為這個中譯本畢竟刪去了過去所有日文版本都保留的那篇背景為台灣的晚年短篇小說代表作《淡水河心中》。

《淡水河心中》是一篇在日本發表後於日本文壇引起很大反響的作品，初見日本同人文藝月刊《展望》1951 年第 7 期。淡水河是台灣的一條河，而“心中”則是一個地道的日語詞，意即“殉情”。內容是通過第三者之口敘述了一樁發生在淡水河畔的扑朔迷離的殉情案。字里行間以及人物對話的腔調里閃現着作者犀利的諷刺和批判。

筆者認為，這篇作品不同於一般性反抗文學，或曰超越了單純反抗意識而上昇到哲學層面的“文明批評”的價值所在。它所展示的代表陶晶孫風格的辛辣筆調具有三重針對性，其一針對 1945 年以前日本對台灣的統治，其二針對日本投降後大陸國民黨政府遷來後的暴政，其三針對歷史上台灣人對外來統治顯現出來的“奴隸劣根性”。小說發表當時贊譽性評價幾乎都集中在小說的魔幻般柔性語言和獨特的幽默感上，而 90 年代伊藤虎丸的《解題》第一次把對這篇小說的評價提高到了意識形態層面的“文明批判”高度。伊藤指出：陶晶孫的這種“文明批判，既是對形而上學的罪惡的指控，也是對日本近代精神本身的批判”³¹。

如果說該書存在所謂的作品選編過程的話，那麼這種“選編”僅指兩件事。一是加進了一篇針對中國讀者的“導讀文字”，二是刪除了小說《淡水河心中》這篇能夠代表 1945 年以後的陶晶孫文學的作品。這種“選編”也許基於 2008 年 8 月中國出版行業內部的某種特殊實情，但這種不惜對代表作品的割舍，不得不說給後世留下了莫大的遺憾。

結語

以上對陶晶孫原著《日本への遺書》的三個日文版本和一個中譯本進行了詳細考證。通過本次考證，釐清了過去被研究界忽視了的一些問題，例如日本文學批評界對陶晶孫日文創作的價值評估，幾個版本收錄作品的變化以及發生變化的原因等等。

本文考察得出了兩個較為重要的結論。第一，佐藤春夫、須田禎一和伊藤虎丸各自代表了日本現代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個時代，他們都對陶晶孫及他的文學做過“概論”，但從總體上講，日本文學批評界針對陶晶孫文學活動評價的側重點，既不在早期創造社文學活動期陶晶孫用漢語創作

31 伊藤虎丸《『解題』戦後五十年と『日本への遺書』》，《日本への遺書》第 231 頁。

的作品，亦不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陶晶孫在上海展開的倡導“大眾文學”的文學活動，與之相比更看重他的日文創作。這種文學批評從早期作家們的感性評價發展到 90 年代伊藤虎丸的“形而上學層面”哲學批評，堪稱一種質變性提昇。

第二，中國國內批評界由於直至 90 年代末一直囿於對陶晶孫這個人物的政治判斷而忽略了他的文學成就，而且這種停滯不僅限於對陶晶孫的日文作品研究。2008 年中譯本《給日本的遺書》的出版雖然只算起步，但至少可以說宣告了中國學術界對陶晶孫日文作品研究的不毛時代的終結。

上个世纪前 50 年的中國文學發展無不跟“國家的解放”和“民族獨立”緊緊地捆绑在一起。從封建社會到民主主義社會的過渡過程中，中國經歷了幾次國內戰爭和 8 年抗戰，文學反映了這段歷史，作家們在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或成長成熟，或蛻變墮落。

自從 1994 年夏衍提出陶晶孫屬於“中共安插在上海淪陷區的秘密工作者”這一說法以後，文學家陶晶孫在中國的地位發生了扭轉性改變。然而，這樣某個人的幾句可以改變一個作家命運的“證言”，夏衍不僅抗戰結束之後沒有提及過此事，即便在解放戰爭時期以及文革中他被打倒並失去話語權之前的十多年漫長的時間裡，他也從未言及。這顯得不大自然。

陶晶孫是一個體弱多病但性格非常溫和的“儒雅之士”，他跟革命家郭沫若同樣畢業於九州大學醫學部，同樣娶了日本妻，而且同樣既愛祖國又愛日本。然而於民族存亡之際，夾縫中生存的他却未能像郭沫若那樣“別婦拋雛”，用民族的“大義”代替小資的“博愛”。也許他的知己柘植秀臣的洞察更加深刻：他畢竟“不屬於那種獻身於革命的性格剛毅的人”一類。陶晶孫非常坦誠。正如他自己所說，一切的一切都因為他“軟弱”。

我們通過對歷史的考察，看到了陶晶孫的精神底線是良心的純潔。為難時也許會一再忍讓退讓，但這種忍讓和退讓絕對不會越過良心的底線！上海淪陷期進日本人辦的自然科學研究所是因為他熱愛醫學，同時渴望通過對寄生蟲的研究拯救家鄉父老；另外，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召開時留在“淪陷區”未南下的作家本來就為數不多，陶晶孫三次被邀列入參會者名單兩次推脫，即便第三屆大會參加了也是滿腹牢騷，除了上台作了個“請政府規定老年作家年金案”報告之外，沒說半句針對“聖戰”和“大東亞共榮”的好話。為此還惹得日本作家參會代表高見順的破口謾罵³²。

不難設想，陶晶孫如果真的肩負有地下共產黨交給他的“臥底與敵後”的重大使命，那麼他完全可以效法郭沫若 1937 年逃離日本之前在日本人面前大放煙幕，當面高喊兩聲“大日本帝國萬歲”。因為獲得日方信任既有利於“臥底”工作的展開又有助於自我保護。他大可不必於大庭廣眾之下攻擊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讓日方當場下不來台。然而事實上陶晶孫並未那樣做。史料所顯示的才是真實的陶晶孫。筆者認為，這樣外柔內剛性格的陶晶孫，應該比“勇敢的臥底鬥士”顯得更加有血有肉，更加真實。

32 日方與會代表高見順在《上海的蜚》中寫道：“支那作家在上海的也罷，從北京來的也罷，發言時都他媽的不提半個字表態順應日本國策，統一口徑只訴苦，要求改善作家的生活”等等。參見日本中央公論社 1976 年 12 月出版高見順《上海的蜚》164-165 頁。